

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 回忆



刘国霖 著 译
铃木传三郎（日）著

學苑出版社

60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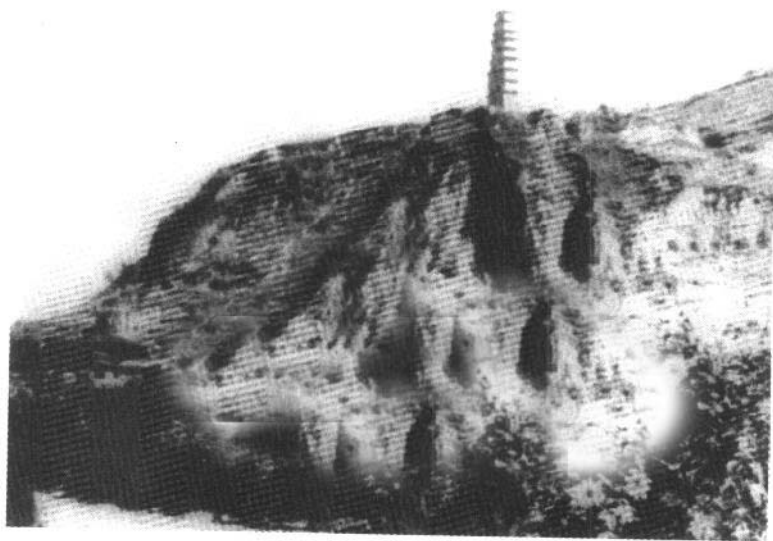
2251
L716

一个“老八路”和日本俘虏的回忆

刘国霖 著

铃木传三郎(日)著

刘国霖 译



学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“老八路”和日本俘虏的回忆/刘国霖, (日)
铃木传三郎著. -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0.6

ISBN 7-5077-1723-2

I. 一… II. ①刘…②铃… III. 革命回忆录-中国
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7579 号

图字: 01-2000-1558 号

责任编辑: 张 翔

《当了俘虏去延安》是根据日本国书刊行会 1983 年日文版
《延安俘虏日记》译本。

一个“老八路”和日本俘虏的回忆

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电话: (010) 68281490、68279295

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邮编: 100036

北京市兆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32 开本 8.5 印张 148 千字

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-5000 册 定价: 16.00 元

一、我在故乡

我的故乡——广东省顺德县处于珠江三角洲，是个富饶的地方，土地肥沃，交通发达。大概自南宋时代起，就有大量移民来此垦殖，逐渐形成所谓“四水六基”（40%鱼塘 60%桑地）的农业，每年可养蚕达8造（代）之多，大量生产生丝出口，是有名的“黑胶绸”产地。但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，蚕丝业日渐衰落，进入30年代，竟然发生过蚕农因为蚕茧卖不掉，生活无着落而自杀的悲剧。据说这是中国的蚕丝技术落后，生丝产品质量不如日本，被挤出国际市场的缘故。当时有识之士大喊改良技术，企图挽回颓势。在这种呼声中，我走上了学习蚕桑技术的道路，1932年考入广州市的仲恺农工学校（今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）的蚕丝科。我父亲在我入学时警告过我：“廖仲恺^①是国民党的左派，听说那个学校共产党很多，1927年曾经枪毙过好些学生，你可要小心！”其实，我这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政治上是白丁，哪里知道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，在学校只是一心想学些蚕桑技术而已。

^① 廖仲恺（1877—1925），国民党左派，广东惠阳人，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。1893年回国，1902年赴日本留学，1905年参加同盟会。辛亥革命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，并担任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、广东省省长、财政部部长、军需总监，1925年8月20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。

我在学校的几年（1932—1937年）中，除了学习技术课以外，也逐渐模糊地知道一些中国的问题。中国不仅仅是要解决技术落后，更重要的还要和帝国主义作斗争，从帝国主义奴役屈辱下解放出来。1933年，学校的名誉校长何香凝（廖仲恺夫人）为了把廖仲恺的墓迁到南京紫金山而回到广州。我以“学生自治会”的代表身分，和几个同学一起，到广州东山百子路10号（后来的八路军广州办事处）探望她，并请她为学生会办的刊物写篇文章。她当时病卧床上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如果要我的文章，就把《告黄埔同学书》和上海出版的《妇女杂志》上的由我署名的文章拿去转载吧！”我们一看，满篇都是骂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。其中有一篇是首诗，她把一套妇女穿的衣服和这首诗派人送到南京给蒋介石。我还记得有这样的句子：

.....

不战送山河，
万世同羞耻。
吾侪妇女们，
愿作沙场死。
将我闺阁裳，
换尔征衣去。

.....

在当时蒋介石实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，积极“剿共”的情况下，我们十分敬佩何香凝的胆识。

她还说：“当初办这所学校，是为了培养些青年去和帝国主义作经济斗争的，可是现在已经不是经济斗争的问题，而是要和帝国主义作生死斗争的问题了。”她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，拨开了我思想上的迷雾。我虽然没敢把那篇文章转载在学生刊物上，但也把它张贴在宿舍里的公布栏上。当时“九一八事变”已经过了两年多，那文章后面还赫然有“本篇文责，作者自负”字样。

此后，在1936、1937年，日寇日益露出侵华的狰狞面目，策划了什么“华北五省自治”、汉奸殷汝耕组织“冀东自治政府”等等。蒋介石一个劲退让，抗日救国运动尤其是学生抗日运动热潮不断高涨。北平的“一二·九运动”得到全国爱国青年学生的响应。我们学校的进步同学办起了宣传抗日的小刊物，也被国民党当局查禁。主办的学生几乎被逮捕，只因事先得到消息，穿着木屐逃走才幸免。

我们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留学过日本的，主要的专业讲义多出自日本，参考书多为日文，学的外语也是日语，教务处的阅览室有许多日文杂志，例如那时日本出版的《改造》之类，因而我们有阅读日文能力的学生也常去看那些日文杂志，能看到国民党统治下难以看到的中共的许多文章，例如《八一宣言》、有关“西安事变”的真实情况介绍，这使我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有所了解，思想上产生了对共产党政策的同情。

1937年夏天我毕业了，母校以每月25元的工资留

我在蚕桑部当实习生，跟一位朝鲜籍老师桂应祥搞遗传育种研究。“七·七事变”之后，广州老百姓天天在日寇空袭之下生活，空袭警报一响，立即把工作停下，躲进水深过膝（广州的地下水位高）的防空壕里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我虽然一度随学校迁到乡间，但总觉得在国家存亡的关头，自己却埋头于研究工作，问心有愧。每当听到当时很流行的“义勇军进行曲”的歌声，就立刻想走上抗日战场。于是，我坚决把工作辞掉，但具体往哪里走，也很茫然。当我在刊物上看到介绍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时，喜不自胜。许多同学先后往陕北走了，还来信作了介绍，更使我下决心去陕北。但问题又来了。去陕北的路费约需 30 多元，而我的经济收入仅够生活开支，一点积蓄也没有，又辞掉工作，经济没有来源，父亲的收入也微薄，还要抚养我的弟妹，很难张嘴向他要。正在彷徨之际，幸得一朋友赞许我的意志，取下手里的金戒指给我，我又向要好的同学筹借一点，才凑足路费。在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开了介绍信，还给父亲写了一封“不辞而别”的信，我就奔往从未去过的陌生而又遥远的地方——陕北。

我行前写信给父亲告诉我的去向，也许是受了孔子说的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”的影响吧！父亲在广州沦陷前逃到香港，在香港穷病交迫而死，但这是到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老家通讯联系时才知道的。

二、到陕北去

1938年广州、武汉沦陷日寇以前，国民党在政治上虽然是和共产党合作，让八路军在武汉、广州设了办事处，公开反共的事情不多，但暗地里还是千方百计阻挠甚至扣留去陕北的青年学生。对此，我做了充分的准备。考虑到他们在交通要道上一定要检查，我就自己虚拟一封介绍自己去西安求职的信件，而把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云广英主任亲笔写给“林、罗同志”^①的正式介绍上抗大的信藏好，缝到衬裤里面。办事处还告诉我，到汉口之后如果遇到麻烦，可以去找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。经过这些准备，我在1938年9月14日乘开往武昌的列车，踏上去抗日军政大学的征途。

从武昌渡江，在汉口住了一夜之后，换乘去西安的列车。在大智门车站进站时，有国民党的宪兵在逐个盘问。我对国民党的宪兵历来都很反感，他们全是欺压老百姓、随便打人骂人的坏家伙。列车经过衡阳停站时，我从车窗口探伸出身子喊小贩买东西，宪兵就朝我打了一拳，把我推回车子里。这次在汉口上车，宪兵审问我：“上哪儿去？”答：“西安！”“去西安干什么？”“我父亲在西安做生意，找我父亲去！”“什么生意？”“开杂

^① 指当时抗大校长林彪、副校长罗瑞卿。

货店。”“在西安哪里？”“西大街 15 号。”我对答如流，没有一点慌张，于是宪兵很快把手一摆，让我进了站台。我心里还骂：“真是蠢猪！”列车开动之后，我觉得很安然，去延安的路可以说是走了一半了。

因为躲空袭，车子走走停停，从汉口走了一昼夜才到达临颖站停下不走了。在三等车上，困了也没处睡，我只得悄悄地爬到行李架上睡。我这个广东的小青年，从未出门远行过，经验还很欠缺，皮鞋脱下放在座位下面就安心睡了。天亮了下来去上厕所，不禁大吃一惊：我惟一的一双皮鞋被人偷走了！幸亏车上还有我看得出也是去陕北的学生打扮的老乡，一听我的不幸，很快给了我一双胶底的拖鞋，这才得以缓解我的狼狈。

列车终于在早上 9 点开动，过了郑州一路往西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响起了空袭警报，列车一下子进了隧道停下来。敌机是炸不着了，心里倒不怕，可是蒸汽机车上喷出的煤烟进入车厢，呛得使人受不了，我只好跑到车门口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等候列车开动。过了大约 20—30 分钟，车终于开动了，我穿着拖鞋转身返回车上，脚上的一只拖鞋被车门一碰，掉到了列车下面。车子开动了，当然不能下去捡回，这倒霉事真叫我生气！心想剩下一只拖鞋，也没有什么用，干脆把它也扔到车下，让人家捡到也可以成双地穿。此时的狼狈相，我终生难忘。

1938 年 9 月 19 日到达西安，我是光着脚走出车站的。第一件事当然是先去买一双鞋，然后找了一间旅馆

住下。当天就立刻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报到。他们就让我在招待所住下。那时的招待所住满了等候安排去延安的青年学生，睡的是地铺。我一看，实在太挤，就说：“我已经在旅馆住下，这里太挤就算了。”办事处同意，把我的名字记下，让我两天以后到办事处编队去延安，并且嘱咐我注意国民党每晚要查旅馆，可能刁难外地去陕北的学生。他们还简单介绍了一些抗大的情况、路上的情况和陕北天冷等情况。西安9月末的气温不算低，天一黑，我就离开旅馆，跑到街上去逛逛，顺便观光一下这个西北大城市。我头一次看见挑担子点灯笼、卖似乎是稀饭煮鸡蛋的，价钱也不贵，感到很稀罕，就买了一碗尝尝。觉得有点甜，有点酒味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也不好意思问，怕人家嘲笑我这个“小老广”。过了很久，熟悉北方生活以后，我才知道那是用糯米做的，叫做“醪糟”。

终于到了9月26日，一大早在七贤庄办事处集合编队。这一天，编队的大约有40人左右，领队的人由办事处派出。我刚到北方，虽然学过“国语”，也只是粤式的国语，交流有些困难。但这群人中间，从广东来的多达七八人，语言、思想、情趣都很接近，成天都用广州话交谈，所以我不但不感到寂寞，反而逐渐产生了志同道合加老乡的亲切感。

头一天步行只走到泾阳，路程不过40—50里，直到天黑才到。天晚了住在泾阳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，

晚餐是每人一大块“锅盔”和白开水。北方人见了笑逐颜开，我们这几个“小老广”就不知所措了。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有人咬了一口说：“是面饼，淡然无味！”谁也没有见过，更不用说是吃过了，入口一嚼，真是有“味同嚼蜡”之感。虽然走了一天路，肚子很饿，但还是怎样也咽不进胃内。后来有位来自香港的同伴很有把握地说：“我有办法保证好吃！”原来那时正值中秋前十来天、月饼上市的时候，他在行李里藏有几块广东的“双黄莲蓉月饼”，他把月饼都切成小块，分给我们，变成“锅盔夹广东月饼”。一吃，果然味道大为改善，本来难以下咽的“面饼”，变成近乎点心的美食。

第二天，只走了半天就到了三原。因为这些学生们从未经过行军锻炼，两天行军很是疲惫，于是在三原休息了一天。我在西安时知道陕北很冷，随身只带了一件很薄的棉大衣和棉毯子，连棉被也没有，就买了一床8斤多的棉胎。本来想买布做成棉被的，但身上只剩下6—7元钱，买布，钱不够；只带着棉胎，路上又不方便，我就把棉毯子包上棉胎作成包裹，从三原县邮局寄到“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刘国霖收”。我想抗大人那么多，我也不知道会编到哪个单位去，将来收到收不到还是个未知数，如果收不到也就算了。到邮局办寄出手续时，巧遇一位广东人的邮局局长，他一眼就看出我是去延安抗大的青年，就说：“陕北天气很冷，那里的人冬天都要穿皮毛衣服才能过冬，你们去恐怕吃不消的……唉！

其实抗战去哪里也可以，何必千里迢迢到那个又穷又冷的地方去呢？”听他这一说，我立刻明白这个老乡是国民党的官僚。听说那些邮局里有不少人还是国民党的特务，在北方遇到一位老乡的亲切感就立刻烟消云散了。

以后继续北上，一天到辉县，一天到同官（今日的铜川）。黄土高原越走越高，一座山又一座山。黄土对我这个生长在珠江三角洲的青年来说，觉得很新鲜，它的地形地貌同迄今为止见过的大不一样。经过几天的行军锻炼，大伙儿倒也不觉得很疲劳了，向往多时的抗大一天比一天近，伙伴们情绪也日见高涨，抗战歌声也开始变得多起来了。

从同官到宜君的路上，成天细雨绵绵。因为不知道当时正值雨季，没有一点准备，棉大衣也淋湿了。黄土高坡经过雨水一淋，变成了一条泥泞的大路，走在平路上还可以，但一上坡路真是艰难，往往走到比较陡的坡上不但不能上去，而且稍站得不稳，就像从滑梯上滑溜下来似的。这时才真正尝到了什么叫做“艰苦锻炼”。到抗大后，才知道罗瑞卿副校长曾说过的话：“青年学生从家里出来，徒步到延安进抗大，就是一个考验。”

这一天穿着湿透了的棉大衣，走了几十里泥泞路，大家又冷又饿，行进速度慢了。从同官出发走不出十多里，就三三两两地分散走。我只和一位一块从广州来的人相伴，他一路叫苦连天，我虽然也有些难受，心想去延安的这目标是定了，是“过河卒子”，再苦也得拼命

向前。直至天快黑，总算到了宜君。一看这个县城，竟然只是坐落在山顶上的一个小镇子，比我想像中的小镇还小，这才体会到北方南方差别之大。晚上住到澡堂，把脱下来的湿漉漉的衣服一件件烤干，这才躺在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澡堂座位上，暖暖和和地睡了一夜。

第二天起来雨仍在下，天气比西安冷了很多。大家都疲劳，带队的同志决定休息一天。我在街上吃午饭时，第一次吃到了不大习惯的羊肉面条。一般广东人觉得羊肉味腥膻，不很爱吃，但又认为它是滋补之物，我也只好勉强“滋补”一下了。

从宜君出发一天就到达洛川。当时洛川还是“国统区”，但有抗大的一个大队。那里的人似乎对八路军看得不特别神秘，我也开始有了“渐入佳境”的感觉。这种气氛到了郃县，就更浓厚。听说再走一天就到甘泉县，就归陕甘宁边区管辖了，我的情绪和天气放晴一样好转，有“快到家了！”的感觉。

以后，经过两天的行程，就到了甘泉县。甘泉县很明显的和“国统区”大不一样，老百姓对我们这些学生都显得很亲切，虽然语言还不能交流，但从面部表情上看得出他们把我们看作八路军一样，充满热情地以“同志”来称呼。

到甘泉的第一次晚餐，是我久仰大名而从未亲尝过的、象征着革命的小米饭。呵！听说有一个香港某洋行的买办的少爷，被去延安参加抗战浪潮卷到了陕北，进了

陕北公学学习,吃了小米饭和黑豆发的豆芽,他就写了封信去香港家里,附上几粒小米和黑豆豆皮,说在延安就是吃的这些东西。他原来在家里喂小鸟用的就是小米。这一下子,他父亲慌了,立刻寄给他许多钱。(当时肤施县邮局是国民党办的,香港沦陷前可以邮汇。)他就在班上给同学们每月每人发些“特别津贴”,觉得自己是个“共产”主义者,先用自己的钱“共产”一下。

其实,第一次吃小米饭,觉得还是很不坏的,同吃大米饭感觉差不多,别有风味,而且吃上小米饭,就表示自己从此成了一个“革命者”,进入边区就摆脱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了。我一下子竟然吃了两大碗!

三、进抗日军政大学

在甘泉过了一夜,一大早吃了饭,精神抖擞地走上延安的路。90华里行程,是离西安后一天走得最远的路,到中午我脚下的鞋子已经破得不能再穿了,不得已把它丢掉,整个下午光脚走。广东孩子光脚走路并不稀奇,相反觉得比穿双破鞋还舒服得多。幸亏一路天气很好,天高云淡,不冷不热,斗志昂扬地在傍晚到达延安城南一带。山的两旁窑洞已经点灯,山上层层灯光,活像香港的夜景。歌声此起彼伏,心情兴奋激动,比起在“国统区”成天被炸,死气沉沉,简直就是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我们被带到城里抗大招待所住下，据说那个房子是旧时代的“府衙门”。人很多，都只能在铺上谷草的地下睡。到延安的第一个晚上，虽然经过一天步行，理应是很快就会沉沉入睡的，而我则思前想后，兴奋难眠，加上身上奇痒难忍，久久难以入睡。天亮时一打听原因，才知道跳蚤作祟所致。我到延安以前，只受到过蚊子和臭虫的折磨，对跳蚤从未领教过。第二天我不敢再睡在那儿，从仅剩下的3元路费中，拿出4角钱住到西北旅社，在炕上过夜，才得一夜的安眠。但这个办法并非长久之计，有经验的北方同志告诉我，他用一床被单缝成口袋，名曰“跳蚤包”，晚上把自己装进去，用绳子反扎紧，跳蚤进不去。我只有一身棉大衣，无法仿效，只好天天去喂跳蚤。不过几天之后就逐渐习惯了。人呀人，突然过艰苦生活，真不容易。好在我来前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，此后才得以逐渐适应。

一周过后，我从三原寄的包裹，居然寄到了。在招待所的公告栏上，有我的寄到包裹的名字，真是喜出望外。10月的延安寒冷的晚上，我在棉大衣里卷缩睡了几天后，终于得到异常舒适的温暖。那床大棉胎用毯子作被面，一直陪伴我渡过了一个西北高原的寒冬。

延安在1937—1938年之间，真是个热闹非凡的圣地，从全国四面八方涌进大批的有志青年。我到延安的那会儿，抗大和陕北公学几乎每天都能编成一个百十人的学员队。在街上，在窑洞里，你都可以听到不同的各

省的口音，远到海南岛，近的有华北各地，华侨子弟也不少。正如《延安颂》所唱的那样：“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，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……”

10天之后，我被编到抗大的第五期七大队三（中）队去，地点在离延安东北70里的蟠龙镇一带，大队部在镇上，我队就住在蟠龙附近的叫做帽儿沟的村子。住房大部分是老乡暂时闲置的比较破旧的房子，于是大家一齐动手，和泥的和泥，盘炕的盘炕，补墙的补墙，经过十几天紧张劳动，总算有了蛮好的营房了。

当时最困难的要算是粮食。本来是有足够的公粮可吃的，由于秋收一过，老百姓多数被动员去延安修飞机场，缺少打场的劳力，到了修完机场，又逢雨季，所以粮食大部分都摆在场上，群众只有维持自用的，无公粮可纳。供给部只发下相应的钱，让各队自己去采购，但只能买到少量的麦子和小米、南瓜。于是，把麦子用碾子简单碾碎，熬成洋芋（土豆）南瓜加上少量的麦片小米粥，每天两顿，每人盛上满满一茶缸，吃得快的还可以再盛到一缸，吃得慢的也就没有第二缸。大家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，每天劳动修房子，这样的饭食，怎么说也不能吃饱的。有一天轮到我值厨，跟着上士去采购粮食，牵着一头骡子到附近的山沟，挨村子求村公所帮助买小米。但哪里有呢？根本就买不到。最后只买到不少大南瓜，把南瓜塞满口袋里，搭在骡子上。上士自己还背了三四个，又让我背上两个。那里的南瓜真

大，我在广东就没见过这么大的，这两个南瓜少说也有大秤 20 斤（延安习惯大秤 24 两为 1 斤）。从未干过重体力劳动的我，实难胜任。不背吧，上士比我多背一倍，我不好意思不背。硬着头皮，背上两个大南瓜，走走停停走了十多里之后，到了一处山沟河边的路上，脚下一滑，袋口开了，两个南瓜沿山坡滚到了河边上。自己觉得太无能，狼狈地又绕了一段路下去，重新把两个大南瓜背上。麦片南瓜洋芋粥吃了大概十来天，公粮才发下来，改吃一天两干（小米饭）一稀。每个班有了一个直径大约 30 厘米、高 15 厘米左右的白铁片菜盆，每餐不是洋芋就是白菜或南瓜。听说每人每天菜金（包括买煤、食油等费用）是 7 分钱，我们队一百多人，每餐就这么一点副食，斜照着看，菜汤上浮着的油星依稀可辨。用今日的语言来说，那油仅仅是“象征性”的。我在广东虽然也是个穷学生，但每餐都有大米饭和鱼、肉可食，在此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说不觉得苦，那是瞎话，可是想起“艰苦奋斗”这句话，而且人人过着一样的艰苦生活，也就泰然处之了。

在这样的艰苦生活中，除了吃饭问题之外，还有一种使我一时实在难以忍受的折磨，那是身上长了虱子。刚到延安几天，到东门外的延水里洗澡，水温虽有点低，但尚可忍受。每天都要“冲凉”的广东人两三天不“冲”一下，比什么都难受。当几个“小老广”冲了一阵之后，发觉衣服上有会动的白色小虫，惊讶地嚷起